

歷史地理



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

香港城市大學
中國文化中心 編

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

K100.6
20117

歷史地理

主編：鄭培凱教授
責任編輯：范家偉



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
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

© 2002 香港城市大學
2006 年第二次印刷

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。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媒介或網絡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、數碼化或轉載、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：962-937-078-6

出版

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
香港九龍達之路 83 號
香港城市大學
網址： www.cityu.edu.hk/upress
電郵： upress@cityu.edu.hk

© 2002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Second printing in 2006

Historical Geography
(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)

ISBN: 962-937-078-6

Published by

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
83 Tat Chee Avenue
Kowloon, Hong Kong
Website: www.cityu.edu.hk/upress
E-mail: upress@cityu.edu.hk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總 序

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傳統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體系，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，幾乎土崩瓦解，經歷了充滿創傷與痛苦經驗的轉型。一個半世紀以來，中國人的生活體驗，也隨着西潮的波濤，在巨浪滔天的環境中載浮載沉。晚清的自強與改革，其實是自救與圖存，清清楚楚認識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。先是軍事的改革，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，再來是經濟的、政治制度的、社會結構的改變，前腳還未離開，後腳又到。自強運動不靈，便有戊戌維新；維新失敗，便有辛亥革命；革命推翻帝制，卻帶來了軍閥割據，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，激起文化階層的意識變動，之後更深入到民間，調動全民的參與。國民革命繼之以共產革命，革命之不足，還要「繼續革命」，一直革到文化大革命，文化砸爛，斯文掃地，到了革無可革之時，這才否極泰來，「待從頭收拾舊山河」。

文化依存於人的生活。當一個民族經歷着百多年的生死掙扎，一心只想着救亡圖存，其文化心態當然也就很難平衡，總是大起大落，大取大捨，矯枉過正。到了 21 世紀，大多數人都認識向西方傳統學習的必要，但激進者卻一定要喊出「全盤西化」；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保存固有文化中的優良傳統，但國粹派卻一定要提倡「尊孔讀經」；大多數人都瞭解應該汲取多元中外文化傳統的滋養，但在文化論壇上卻仍能聽到「打倒孔家店」、「崇洋媚外」、「推翻吃人的禮教」、「痛打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」這樣的充滿激情與暴力的偏執口號，交叉喊話，來回挑釁。

從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角度來看，近兩個世紀的環境不但惡劣，而且充滿了摧殘生機的陷坑與風暴。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心靈，也就難免畸型，充滿了戾氣與不平衡的心態，以為「除舊佈新」、「破舊立新」可以開創美好的未來。更以口誅筆伐的手段來排除異己，建立輿論權威。不僅一般社會中瀰漫着「推倒重來」的文化態度，連學術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，甚至配合政治運動，實踐「矯枉必須過正」的荒謬理論。

當追求知識的人不能與現實利益保持距離，不能以長遠的歷史文化作辭認識的座標，只幻想着當前的參予與投身，希望通過批判與改造來創造文化，以達成士大夫「先憂後樂」或「知識分子良心」的願望，他們就忘了人類文明累積的「知識」為什麼是寶貴的文化遺產。把文化遺產當作實用工具，企圖謀求個人名利，固然是下焉者；企圖謀求國族復興之道，把文化轉為政治與經濟運作的附庸，也不見得是人類的長遠之福。現在的社會太着眼於功利、太講究價格與利潤、太迷信當前的實效，完全忽視了生活的品質、人文與大自然的協調、生命的快樂與幸福。我們看到許多政府、大財團與跨國公司都在經營文化事業，表面上是重視文化與生活的關係，也算好事，另一方面卻以麥當勞與狄士尼的經營理念使文化庸俗化，變為賺錢的工具，則有損文化的長遠發展，同時阻礙一般人文化修養的提升，讓人沉迷於單調無聊卻能暫時刺激感官的活動。

近來我出版了一本文史哲藝隨筆集，以「高尚的快樂」作為書名。這裏摘錄兩段，說明我所謂的「高尚的快樂」是什麼：

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 (Demokritos) 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，寫過很多關於藝術的著作，可惜大都散佚了。幸存的殘篇裏有一段話，充滿了智慧：

「不應該追求一切種類的快樂，應該只追求高尚的快樂。」

什麼是高尚的快樂？德謨克里特沒說。或許他說過，卻散佚了；或許他從未具體討論過，因為他認為那不用多說，是人人都知道的。不管他說過沒有，這段話還是充滿了質樸的智慧，因為明確指出了，快樂有等差，並不是所有的快樂都高尚。

問題還是回到：什麼是高尚的快樂？也許18世紀的康德在具體分析美的藝術時，提供了解釋。康德的『判斷力批判』把藝術分成兩種：為了感官享受的「快適的藝術」，與提供反省快樂的「美的藝術」。前者「單純以享受做它的目的……叫人忘懷於時間的流逝」；後者則「是一種意境……雖然沒有目的，它仍然具有促進心靈諸力的陶冶以達到社會性的傳達作用。」（宗白華譯）

也就是說，高尚的快樂是要超乎感官享受的，絕不能只停留在康德所謂的「當前的歡娛消遣」。

人類創造文明，追求文化與藝術的發展與提升，使自身的性靈更美好、更高尚，是人異於禽獸、作為萬物之靈的展現。每一個文明的高度發展，雖然牽扯到各種錯綜複雜的階級與人際衝突與鬥爭，但放在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看，總體的累積卻明確顯示，人類企圖藉着文化的創新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中國文化也不例外，累積了五千年以上的經驗，其中有成功的愉悅，也有失敗的痛苦，有造福人群的績效，也有殘害蒼生的教訓，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借鑒，更是我們創造明天最寶貴、最實在的資源。只有充份掌握了自己身邊的文化資源，我們才會瞭

解為什麼社會的發展要均衡，為什麼人際關係要和諧，為什麼應該愛好和平、反對戰爭，為什麼追求經濟效益不能唯利是圖。

香港城市大學於 1998 年開始創立中國文化中心，在校長張信剛教授的策劃下，規定全校學生必修六個學分中國文化課程，以奠定大學生最基本的人文素質。在全校各院系群策群力的支持之下，順利推展了一系列教學新猷，如網路教學、中國文化與藝術示範講座、文化古蹟考察等等。為了舉辦文化講座，我們盡量網羅海內外的碩學名儒，到城市大學來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，與大學生探討各個學術領域的新知。進行了四年，成績斐然，而且累積了令人羨艷的演講材料。

這些從不同學術領域探討中國文化的講辭，凝聚了講者幾十年研探的心得，用淺易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，不但是大學生踏上學術道路之門徑，也是一般人瞭解中國文化的方便法門。有鑒於此，我們徵得講者的同意，又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，由本校的大學出版社推出這一套「中國文化講座系列」，盼能為中國文化的創新盡點綿薄之力。

這套系列從構想、企劃，到印成白紙黑字，貢獻最大的是中國文化中心的老師及城大出版社的同事。我還要特別感謝張信剛校長、高彥鳴副校長及黃玉山副校長的鼎力支持，更感謝出版社鄺子器社長的投入及范家偉博士孜孜不倦的協助。中國有句俗話，「眾人捧柴火焰高」，也就是集思廣益，集腋成裘的意思，但表達的感覺要積極進取的多，充滿了樂觀向上、欣欣向榮的心情。我們推出這套「中國文化講座系列」的過程，也充份體會了這種群策群力、合作無間的精神，與城市大學的校訓「敬業樂群」（語出《禮記·學記》），倒是若合符節。

既然提到了《禮記・學記》，讓我在此引幾段經典，與同事、同學，及所有愛好人文修養的朋友共勉：

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道。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。

雖有嘉肴，弗食，不知其旨也；雖有至道，弗學，不知其善也。是故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後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後能自強也。故曰，教學相長也。

我們出版這套叢書，也希望能夠教學相長，開創中國文化的未來。

鄭培凱

前 言

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，在規劃大學必修的中國文化課程之時，決定設立文化講座一項，延請海內外名家碩儒，為學生舉辦專題講座，內容反映當前學術界的最新成果，但講法卻要深入淺出。在安排講座之時，逐漸就會浮現一系列的相關專題，「歷史地理」就是其中之一。

我前後從國內邀請了一批歷史地理學的專家，講授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不同側面，累積起來，就成了這一本書。

為了提醒同學的注意，我還在《城市新語》這個專欄中，寫過一篇小文章，以輕鬆的筆調談論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及方向，並戲稱之為「歷史舞台學」。這篇小文有點趣味，茲引如下，以代前言：

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近來請了好幾位歷史地理學家，做了一系列的講座。同學們不知道「歷史地理學」是什麼，就問，歷史地理學是不是歷史加地理，又講歷史又講地理？

我想起小學的時候，有門課叫「史地」，真的是又講歷史又講地理，不過卻分做兩截，講歷史時不講地理，講地理時不講歷史，倒是經渭分明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們小學生可慘了，背完歷史人名地名，再背民國時期各省縣市地名交通物產，好像是西西弗斯推磐石上山一樣，無休無止又無聊，而且永無間斷。

歷史地理學是門跨學科的學問，一時還不容易講清楚。有位講者就打了個比方，說歷史學研究的是歷史上的人物與事件及其因果關係，歷史地理學則是研究這些人物與事件的舞台。

我後來與他說笑，就說這門學問可以改稱「歷史舞台學」或「歷史劇場學」。

說笑歸說笑，卻想起了楊絳的一篇散文，寫她一九三三年初秋，與錢穆先生一同搭火車，由蘇州赴北京的情景。其中一段很有趣：

車過蚌埠後，窗外一片荒涼，沒有山，沒有水，沒有樹，沒有庄稼，沒有房屋，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。火車走了好久好久，窗外景色不改。我嘆氣說：「這段路最乏味了。」賓四先生說：「此古戰場也。」經他這麼說，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，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。我對綿延多少里的土墩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。賓四先生對我講，那裏可以安營（忘了是高處還是低處），那裏可以衝殺。盡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，磷火都曬乾了，我還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，直到「蔚然而深秀」的琅琊山在望，才離開這片遼闊的「古戰場」。

這似乎就是「歷史舞台學」的最佳注腳，希望同學們聽了講座之後，也能改觀。

鄭培凱

編輯綴言

錢穆說，政治制度與歷史地理是歷史研究兩條腿。人靠兩條腿走路，歷史研究也要靠兩條腿走路。歷史是關係到時地人的學問，「地」就是特定地點或地理環境，歷史地理學最簡單的闡釋是「研究歷史時期各種地理現象」，範圍極其寬廣而複雜，既涉及歷史，又涉及地理，一般分為自然地理、政治地理、經濟地理、人文地理，舉凡自然環境、氣候變遷、人文風尚、戰爭國防、經濟資源、交通路線、地名考證，地理沿革，莫不息息相關。

中國傳統歷史學，從《尚書》到歷代正史，皆有地理沿革記述的部分（《尚書》有〈禹貢篇〉，而歷代正史有〈地理志〉），顯示特別著重地理認識，這是因為關係到國計民生。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，上一個世紀歷史地理學經歷了巨大轉變，已脫出傳統疆域沿革的範疇，確立為一門專門學科。在1921年，《史地學報》創刊，在柳詒徵、竺可楨等學者推動下，成為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刊物。可惜《史地學報》維持五年光景，就停刊了。在1932年，在古史辨運動中一舉成名的顧頡剛，創辦了《禹貢半月刊》。《史地學報》和《禹貢半月刊》標幟著中國歷史地理學走進現代學術的殿堂。

本書所收論文全是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，是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文化講座及客座教授講座的演講內容，經主講者整理後由我們輯錄而成。本書雖然以大學生及高中生為對象，內容卻深入淺出，反映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最新的重要成果及研究方法。

在中國內地，歷史地理研究有三大重鎮：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、陝西師範大學。1949年後，顧頤剛弟子譚其驤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歷史地理學，並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所。譚其驤不僅編著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，享譽史林，還培育出極多人材。其中，周振鶴、曹樹基、葛劍雄是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，並留校任教。2001年，周、曹兩位在中國文化中心擔任客座教授；葛劍雄亦應邀為文化講座的講者。葛劍雄、曹樹基是以人口研究見知史林，周振鶴則以政區地理在史學界享有卓越聲望。

北京大學的歷史地理學研究，是在侯仁之領導下開展的，並在城市與環境學系下設置歷史地理專業，培育專業人材。北京大學歷史系李孝聰，乃侯仁之高足，秉承著侯仁之開創的城市歷史地理領域，著力探討北京城歷史課題。另一位來自北京大學的林梅村，出身考古系，他研究的方向可說是承傳了19世紀末邊疆地區（特別是西北）探險式研究。

清代民國以來，在世變刺激下，西北地區邊疆史研究，蔚然成風。19世紀末葉，西方列強雖以船堅炮利打進中國，活動範圍卻遠遠不止於沿海地區。隨著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地區發掘出古代遺址，尋寶風氣日盛一日，英法德日等國家的探險隊，紛至沓來，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英人斯坦因，將大批出土文物及文獻運回英國。因正為他們探險式尋寶，在新疆地區發現了許多古代曾經存在而又淹沒的王國遺址，出土了大量文書，最後發展出了「敦煌學」。林梅村多次親身遠涉新疆，進行考察，並將研究成果帶到城大來，出任客座教授，帶著我們穿梭古國遺址，揭開它們神秘的面紗。

葛兆光也是城大中國文化的客座教授，近年集中精力完成《中國思想史——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、思想與信仰世界》第

一卷及第二卷，由新的眼光出發，分析古代思想與知識世界。葛兆光以思想史家的眼光，解構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。

本書論文編排次序，首五篇屬通論各個朝代，以葛劍雄〈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國疆域〉、葛兆光〈古代中國地圖中的天下觀念〉開首，目的是讓同學先明白「中國」及「中國疆域」的涵義，並對古人如何看待世界，有清晰了解。根據葛劍雄所說，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，疆域的擴大和經濟發展，「中國」一詞的概念是不斷地變化和擴大的，並且不僅具疆域內涵，還具有文化內涵。葛兆光的文章解構古人如何看中國及世界，以為宇宙是天圓地方，而中國就是文明的中心，地理上愈向外延伸，就越荒蠻。其實，正好說明「中國」是如何具備文化的內涵。而中古時期佛教傳入，明清時期基督教文明傳入，為古代中國天下觀帶來無比衝擊。

地圖是人類表達地理訊息的一種方法，古代地圖又稱為輿圖，李孝聰〈古地圖和中國城市形態變遷史〉同樣以地圖為依據，解讀古代城市形態的發展，指出平平無奇的輿圖，除了指示位置之外，還蘊藏了史學、哲學、輿地、文學、繪畫等多層面的資訊，而城市隨著不同階段的歷史發展，它的功能不斷在轉變。如果說〈古地圖和中國城市形態變遷史〉是以朝代發展先後為主軸，縱向地說明城市發展的形態，李孝聰在〈北京城市規劃的歷史演變與傳統文化風貌〉一文，則鎖定北京為個案，全面地剖析北京城從聚落發展到今時今日成為一國之都的歷史過程。北京今天面對着沙漠化及缺水的危機，展開了重新規劃方案，此時回顧北京城的歷史，顯得特具意義。北京在邁向城市現代化過程中，如何保存北京歷史風貌及傳統文化，重視這批寶貴遺產，正是我們努力的方向。

道路是人類交往的血脈，思想文化傳播、經濟貿易往來、軍事行動、政治控制都與道路體系發展，不能割開。自古以來，中國不斷與域外國家接觸，經濟交易在朝貢名義下進行，而商人、僧侶經歷千山萬水，跑到中國來，帶來了經濟與文化的交往。中國古代對外交通，有海路、陸路之分，不僅陸上有絲綢之路，還有學者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說法。林梅村以豐富考古文物，展現出古代中國與西方諸國交往的歷史，這些實物材料見證了古代中外交往的歷史。在〈古代東西方的海上交通〉一文，透過古羅馬沉船遺址及貿易港的發掘，配合中國考古發現及古籍資料，印證古代中西海上交通繁華的一頁。而〈絲綢之路的開闢〉一文，則從世界紡織體系說明中國絲綢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扮演的角色，從而了解絲綢之路的開闢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。絲綢之路的發達，不僅體現了經濟交易，伴隨著經濟活動，文化交流亦活躍起來。在這條路上，曾經因經濟繁盛而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國家，今天這些國家只剩下一片丘墟，昔日繁華的景象，只有依靠出土文物及遺址發掘，才能重現人間。〈絲綢之路上的古城〉一文從 1980 年新疆庫車一個廢棄的佛塔內發現梵文寫經說起，帶出近代英德日等國探險家、考古學家來到中國尋寶的故事。在 1900 年，英人斯坦因在新疆進行考古發掘，發現了尼雅遺址，出土了許多文書，文書上寫滿的是已死去的文字——佉盧文，最後揭開了尼雅遺址就是漢代精絕國之謎。

物質文化有可能透過遺址發掘而重現，思想文化、生活態度、社會觀念在歷史上發生影響之後，雖無法以另一種脈絡重新來過，卻時而引起後人遐思：假如歷史發展的情況不同，其面目是否也會不同？戰國是思想家活躍的時代，戰國七雄為了爭霸採用了不同家派思想，作為治國藍圖，而齊秦兩國是戰國

時期的大國，兩國採用的思想都大異其趣，假如由齊國統一天下，中國文化發展將會走別的道路。周振鶴〈戰國齊秦文化差異〉從政治制度、經濟思想、學術文化、宗教信仰、風俗習尚五方面，剖析兩大地域文化的差異。

道路體系開通，相繼活動亦展開。林梅村親訪古代遺址，利用考古學成果，重現失落古代文明。另一位客座教授曹樹基亦同樣以親身經驗，進行田野調查，為移民尋根。〈大槐樹的故事及其他：談明初大移民〉一文談到移民遷到新的地方後，都會建構自己祖籍的傳說，例如山西洪桐大槐樹，是今華北地區居民發祥地；南雄珠璣巷則是今廣東地區居民發祥地。究竟大槐樹傳說如何形成？與明代移民政策有甚麼關係？文中都會一一追源溯始。當然，移民代表著人口流動，人口流動卻不單單只是生物個體遷移，而連繫著風俗、習慣、技術、語言等同時遷移。曹樹基〈清代移民與民族國家的形成〉論述清代移民政策如何促之使民族國家形成；周振鶴〈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〉則探討歷代移民如何影響方言區的形成。兩文可說是細緻地研究了移民對歷史文化的影響。

移民是人口史的重要課題，歷代政府如何掌握人口，成為國家資源；而中國人口在漫長歷史時段，在數量上又經歷了甚麼變化呢？葛劍雄〈十三億中國人來歷——中國歷史人口概述〉探討歷史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化，今天中國擁有十三億人，從古到今有甚麼因素促成人口增長？

綜合本書所收論文，大致看到以下特點：第一，課題廣泛，已脫出傳統歷史地理學疆域沿革的路子，而走向更寬廣、更深入的研究，既有縱貫各個朝代的論述，又有個案式探討。第二，論文利用的材料多樣化，包括地圖、出土文獻、考古文物、親身訪問，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資料不再只限於歷代正

史、遊記、地理諸書。第三，研究方法方面，除了考證之外，並充份吸取考古學、人口學、語言學等學科的理論，大大地推進了歷史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的結合。第四，論文旨趣具現實關懷，北京城、人口遷移、地域觀念、中西交往在今天仍具意義，可資借鑒。因此，中國文化中心及城大出版社花了巨大的氣力編輯本書，呈獻給讀者。

范家偉

鳴謝

本書部分圖片承蒙下列機構及人士慨允轉載，謹此致謝：

文物出版社 (2.1 – 2.5, 3.1, 3.2, 3.5, 3.6, 8.1)

劉敘杰先生 (3.3, 11.2, 11.4, 11.5)

潘谷西教授 (3.4, 11.3)

廣州出版社 (4.9)

山東教育出版社 (6.1, 6.2)

The Bodleian Library, University of Oxford, UK (7.2)

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(7.3 – 7.6)

上海學林出版社 (7.3 – 7.6)

北京三聯書店 (8.2, 8.3)

福建人民出版社 (9.1 – 9.5)

北京出版社 (11.1)